Co-China 周刊

NO. 178
2014年11月7日

中国领导人称英美是“占中”幕后推手 | 外因化是打压占领运动的基本框架 | 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

看不见的境外势力



编者的话

本期 Co-China 周刊，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的占领运动。

不出人所料，在相关表态中，中央政府及党的喉舌媒体再次使用了“境外势力”这个词，指责这场运动存在有来自国外的“幕后推手”与“阴谋”。在宣传攻势下，这种说法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理解香港这场民主运动的主要框架。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有多高？这种框架的问题何在？为什么总是喜欢归罪“境外势力”？

周刊的第一部分，旨在通过当事人的澄清和事实记录来回应有关境外势力的阴谋论。基本的事实被篡改、当事人的公开回应被忽视，“一个平常的集会描述为阴谋”，在失实和偏颇的基础上，境外势力被推上台面，荒谬地成为了引致此次香港政改风波的“原因”。

一些大陆读者误信境外势力的说法，和信息审查有关。不过有时候，澄清事实并不足以完全吹散阴谋论的疑云。在《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相信阴谋论？》一文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种名为“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的现象：“那些致力于澄清不准确政治信息的努力反而会让人们更加坚信那些虚假信息。特别是当不良信息鼓吹的是某一受欢迎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时，该效应就会更加普遍。”也就是说，如果有的人此前已经相信了“境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种价值观，那么每一次澄清反而会令他/她更加坚定地相信阴谋论。因此，“政治家可能利用阴谋论来谋取选票和优势；但作为普通人宣传自己对政府机构的观点并实现民主的工具，阴谋论毫无建树。”

把香港运动归结为外在势力作用的这种归因模式，不仅遮蔽了我们对运动的真实认识，同时也很可能会堵住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陈韬文在《外因化是打压占领运动的基本框架》一文中指出，“强调外因对占领运动的作用而轻视内因。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外因的主导性之前，认真探究引起运动的内部成因，这样对运动的认识才能接近真实，才能知所应对，最终才能从中有效总结。”而如何回到内因，理解此刻此城走上街道的人们，《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一文给出了重要的线索。

目录



将本刊分享至：         

【1、 境外势力在哪里？】

KEITH BRADSHER：
中国领导人称美英是“占中”幕后推手



《纽约时报》记者

抗议领袖称，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来自美国政府及其附属非营利组织的资助。这些抗议领袖表示，中国官员把责任归咎于外国秘密势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难接受香港有这麽多普通人渴望民主. “这一直是北京的心魔，”主要的抗议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Federation of Students)秘书长周永康(Alex Chow)说，“它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自己的恐惧中。

香港——周五上午，一名年轻抗议者正在这里的一处路障旁边指引交通。他穿着一套仿制版的英军迷彩服，肩上还有英国国旗图案。若是在其他城市，这身装扮可能会被看做某种潮人的时尚展示，不会被当回事。但在香港，它却引发了一番骚动。

一名年龄稍大的抗议者走到他身边，说穿这套制服很不明智，因为它有可能暗示外国势力对亲民主抗议活动有所影响，特别是考虑到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身份。随后，一名迈着大步路过的年轻女子伸出了右臂，对他做了一个拇指向下的手势。这名女子身着一套蓝色裙装，代表对警方的支持。

“他们是少数人，”提到抗议者时，她说。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并接着说道，“他们受到了一些势力的驱使。他们有庞大的物资贮备，那么多口罩——我觉得是美国人出了钱。”

过去两周的静坐示威活动，搅扰了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活动旨在抗议中国政府不允许香港民众在它批准的候选人范围以外选举下一任领导人。然而，中国政府这一立场的背后，并非只是中共对民主变革意料之中的敌意。



中国政府的态度还反映了它长期以来在国家安全方面对香港的担忧——以及在中国官员及其香港盟友和部分公众心中普遍存在的怀疑，即抗议者得到了来自境外的支持。

一些官员认为，美国和英国对香港施加了太大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无法像抗议者要求的那样，放开 2017 年接替梁振英(Leung Chun-ying)担任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提名程序。他们称，这样做可能会带来选民受到操控从而让西方傀儡当选的风险。

“从战略上讲，美国的‘转向亚洲’策略仍在进行中，因此，你能说它不会利用当前的动荡吗？”为中国立法机构提供建议的一个香港委员会的成员刘迺强(Lau Nai-keung)反问道。“北京的领导层就是这样看待当前局势的。”

同情民主运动的人往往认为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但许多支持政府的人宣称，鉴于香港 155 年的英国殖民历史，以及它在中国享有的独特自治权，再加上美国以传播民主为名颠覆海外政权的好坏参半的记录，这些担忧合情合理。

人口方面的因素也是忧虑的源头之一。五分之三的香港人是在英国统治期间长大和接受教育的。多达十分之一的香港居民已宣誓效忠他国政府，持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的护照，其中许多是在香港 1997 年回归中国前的短短几年间取得的。

香港还是外国外交人员最为密集的亚洲地区之一，而且境内拥有多家被中国政府视作对其怀有敌意的非政府组织，比如天主教会、在内地遭禁的法轮功组织、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在前几个工作日里，香港主要静坐区域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但周五夜里，数千名居民再次聚集在了政府总部附近。这是为了展示抗议者的力量和决心，因为一名港府高级官员前一天突然取消了与学生领袖的对话，并且声称抗议活动正在减弱。“他们好像把我们当成了愚蠢的绵羊，大家对此很不满。我来是要证明我们的人数仍然不少，”法律系学生菲利普•于（Philip Yue，音译)说。

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中国官员均迫不及待地把这次的抗议活动描述为：继前苏联和中东之后，西方赞助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最新一例。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他们没有放过任何可能证明抗议者受到西方势力驱使的蛛丝马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影响，其次是英国。

中国资深外交官吴思科在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上撰文称，“人们会发现，支持‘颜色革命’已经成为美国一些人的嗜好和使命。”

的确，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有时会与民主派的成员会面，美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也曾邀请香港市民参加宣传民主的会议。



不过，过去一周对抗议者和抗议领袖进行的数十次采访中，所有人都坚决否认，自己的行动受到了外国政府的引导或操纵。美国同样否认自己在其中发挥过任何引导作用。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斯科特•罗宾逊(Scott Robinson)说，“香港目前发生的事件关乎香港民众，除此之外的任何论断，都是在试图分散对当前议题的关注。香港人现在表达的愿望是获得普选权，从有意义的候选人范围中，通过选举产生能够代表选民意志的领导人。”他接着说，“美国的外交官定期在香港和华盛顿，与广泛代表香港社会的各阶层人士会面，但并不支持任何具体的政党或个人。”

不过，这类表态受到了政府圈子里许多人的质疑。香港亲内地的议员已经呼吁对抗议活动的资金来源和组织方式开展调查。

“并不是说他们在前方指导着什么行动，但他们已经做了五六年的协同工作，培训这些活动人士，指导理论和战术，”一名参与政府对抗议活动决策的人士，在要求匿名的前提下说。

在被要求列举哪些活动人士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时，此人拒绝回答。但他接着谴责了抗议者唱生日快乐歌，把亲政府人士起哄的声音压下去的做法，称这种策略是从美国在其他国家支持的民主倡导者那里学来的。他说，“这么做虽然是和平的，但却是一种暴力”，因为它侵犯了抗议批评者的言论自由。

抗议者给出了一个更单纯的解释：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是因为自己使用的一些扩音器，可以自动播放这首歌曲。

直接由华盛顿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 NED）的年度报告显示，该机构在 2012 年曾拨款 75.5 万美元，去年又拨款 69.5 万美元，用于在香港促进民主机构的发展。其中一些资金专门用于“发展市民在涉及政治改革的公共辩论中，参与讨论的能力——尤其是大学生”。

这段提到大学生的文字，引起了亲内地人士的格外关注，因为学生群体一直站在这波抗议活动的最前沿。不过，NED 的发言人简•赖利•雅各布森(Jane Riley Jacobsen)称，该组织没有提供过资金，对香港市民开展公民抗命方面的培训。

NED 今年 4 月还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的主角是近几十年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民主倡导者——李柱铭(Martin Lee)和陈方安生(Anson Chan)。他们曾游说美国政治人物支持民主运动，并因此激怒了中国政府。批评人士称，他们的这一做法是主动要求外国干预。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现年 76 岁的李柱铭描绘成英国和美国的工具。

亲内地的香港政治人物和媒体批评的另一个对象，是美国领事馆，它经常被形容是从事监视和对华间谍活动的基地，并据称有超过 1000 名美国雇员。这个形象被爱德华•J•斯诺登

(Edward J. Snowden)的事件所强化。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曾在香港短暂避难，他曾向当地一家报纸透露，美国对香港的跨国电信公司亚太环通(Pacnet)实施了黑客攻击。亚太环通与中国内地的主要移动运营商存在联系。

美国领事馆发言人罗宾逊说，实际上，领事馆的美国雇员还不到 150 人。

抗议领袖称，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来自美国政府及其附属非营利组织的资助。这些抗议领袖表示，中国官员把责任归咎于外国秘密势力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难接受香港有这么多普通人渴望民主。

“这一直是北京的心魔，”主要的抗议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Federation of Students)秘书长周永康(Alex Chow)说，“它很容易就会陷入到自己的恐惧中。”

储百亮(Chris Buckley)、Hilda Wang 和 Alan Wong 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储百亮：
美国博士生成香港“占中”阴谋论主角



《纽约时报》记者

“

香港亲北京的报纸和中国大陆媒体都表示，在抗议活动开始大约两周前开的那个 9 月会议，是抗议活动背后有西方鼓励策划的证据，而且，盖瑞特是其头目。盖瑞特并不否认出席了会议，但他和参加会议的其他五人说，对会上讨论的描述是假的，或是编造出来的，或严重歪曲了他们说的话，目的是把一个平常的政治集会描述为阴谋。

”

香港——当丹•盖瑞特(Dan Garrett)拿着装有 300 毫米镜头的相机在这里的街上徘徊，捕捉亲民主示威活动场景、标牌和贴纸时，这位刺有纹身的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最近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目光。

“我觉得不再是纹身的缘故，”他在最近一个早晨开始自己的每日香港抗议营出行之前说。“我觉得，他们读了关于我的事情或看到了网上的照片，他们在想，‘他真正目的是要做什么？他是那个美国间谍吗？’”

亲北京的报纸和香港政客、以及中国大陆的媒体都说他是，并把他作为他们指责香港动荡背后有西方阴谋的主要物证。

理由是他承认过去曾在美国情报机构工作，他们说盖瑞特参与了华盛顿支持的颠覆活动，试图引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叛乱。这个声称是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试图把香港民主运动抹黑为国外势力引起的暴乱的一部分。

“种种证据表明，美国煽动学生罢课，其搞乱香港的意图昭然若揭，”中国主要官方通讯社发的新华微视频这样说，视频还显示了其称之为盖瑞特说的话。

“这个盖瑞特曾在美国国防部、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等情报部门工作，”微视频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间谍。”



现年 47 岁的盖瑞特是一名研究生，喜欢穿短裤、凉鞋和 T 恤衫，他表示非常不解。“这从几个层次来说都很奇怪，”他说。“我不是詹姆斯•邦德。”

盖瑞特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正在写关于香港如何成为对立政治象征之战场的博士论文。令他啼笑皆非的困惑是，他也成了这些象征之一：担任了在他所研究的抗议者中煽动叛乱的间谍的角色，成为西方干涉的实例。

他说，间谍的宣称来自对他的职业生涯和目前工作的古怪且不正确的描述，包括他在九月初参加的一个会议的错误描述，那是一次让居住在香港的外国人与民主派政治人士和学生活动者见面的会议。

“我现在不是、而且从来都不是间谍，”他说。“我成为被一场运动利用的对象，这场运动的目的是让人害怕被描绘为与外国人合作。这是一场含沙射影的战争。”

即使在亲民主示威九月下旬爆发为占领街道的运动之前，中国官员和媒体就已把主要的民主运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描述为西方支持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阴谋。

北京对来自华盛顿、伦敦和其他国家首都的、对香港政治动荡即便是不温不火的评论也表示愤怒，称那些评论是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对盖瑞特和其他外国居民的指责可远远不只是说他们同情街头的年轻示威者。

香港亲北京的报纸和中国大陆媒体都表示，在抗议活动开始大约两周前开的那个 9 月会议，是抗议活动背后有西方鼓励策划的证据，而且，盖瑞特是其头目。

亲北京的《文汇报》上一篇描述会议的文章宣称，他在会上说，“美国坚定支持罢课行动。”还说他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工作。

盖瑞特并不否认出席了会议，但他和参加会议的其他五人说，对会上讨论的描述是假的，或是编造出来的，或严重歪曲了他们说的话，目的是把一个平常的政治集会描述为阴谋。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和编辑珍妮弗•伊格尔顿(Jennifer Eagleton)参加了会议，她说自己也被报道错误地描述为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并称报道引用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她说，“我觉得所谓‘邪恶外国势力’的说法只是想把焦点从香港的实际问题上转移。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言人斯科特•罗宾逊(Scott Robinson)说，盖瑞特不是领馆雇员。“那个关系是编造的，”罗宾逊在电子邮件中表示。

盖瑞特说，他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一个为巡回狂欢节工作的贫穷家庭中长大。他在美国空军入伍，曾在日本驻扎了 6 年，工作是信号情报收集员和分析员，后来在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担任过分析师，中间有段时间在私营部门工作。



国家安全局表示“不能确认或否认雇用情况”，国防情报局没有答复置评请求。

盖瑞特从不隐瞒他过去的政府工作，甚至在他频繁发的 Twitter 帖子中也没有，但是他说，他与曾雇用他的政府部门已经没有来往。

他说，那个间谍指控是个极其怪诞的转移视线手法，尤其是鉴于他 2011 年离开政府是因为自己对许多美国政策不满，包括折磨恐怖主义嫌疑人的作法。当被问及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时，他答道：“赛博朋克(cyberpunk)。”

他十分仔细的街上搜寻似乎也不是那种让间谍看得上眼的研究工作。他参加示威，往返于繁忙的城市街道，以一种强迫性的专注记录着抗议活动的场景。他说，自从抗议活动开始以来，他已经拍了约 2 万张照片。

他指着一个贴满了支持抗议的贴纸、挂满了象征示威的黄丝带的金属护栏说，“我认为这些是弱者的武器。”在一个停车标志牌前，他指着上面的又一个抗议贴纸说，“这个已经在这里贴了快一年了。”

他说，虽然间谍的指控很离奇，但那与他的研究也相当巧和。

“所有这些体验都将在我的论文里有所讨论，”他说。“这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数据。”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区龙宇：谁是猪？谁是人？

区龙宇：工运研究者，美国学术杂志 WorkingUSA 编委会成员

美国资金也资助中国公共机构

早在同年 3 月 3 日 ，《明报》已经报道了美国国会总审计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在年初提交给众议院的报告 ，报告显示过去 5 年美国政府共花 3900 万美元于“发展中国民主的基础项目，也向一些与中国官方和司法部门联合建立的机构提供资助”。这份 GAO 报告今天仍然可在网上找到。美国这些公帑，固然有资助陆/香港的民间团体，但其实也一样有直接 或间接资助大陆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大学等机构。按照这份报告，这包括了资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人代会及其伙伴机构，去改良中国刑事法的辩护程序。但美国的资助，不限于直接资助。众所周知，种种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纯经济援 助的世界银行外援计划等，都有资助中国政府或者各种公营机构，而美国又是这些国际机构的重要资金来源。是以 GAO 也有责任向国会报告这些国际机构的中国项目。例如，联合国发展计划便资助了中国有关机构从事选举制度和刑事法的改良项目。亚洲发展银行在 1999 至 2006 年间，同样就相似项目资助了中国有关机构 355 万美元。如果想找较新数据，可以参考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律学院的 Thomas Lum 在 2012 年的有关论文。

或者有人说，这些报告与论文属一面之词。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根本不会公布有关信息，所以，资讯不平衡的责任，概在北京。

大陆媒体有时候还多少披露这方面消息。2004 年 2 月 23 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了英国学者安东尼-塞奇（Anthony Saich），曾担任 2002 年清华——哈佛中国高级官员联合培训项目的倡导者，为新一代中国官员提供管理培训。之前他担任过福特基金会驻中国首席代表。

福特基金会，不同于 NED，是私人基金会。大陆喉舌对于这些美国私人基金也常常指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势力。实际上呢，美国很多这类私人基金的钱，大部分都落到中国政府搞的“伪冒民间团体”，反而真正的民间团体得到最少资助。专研有关问题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解释道，“在中国，受援项目受到政府的严格监控。美国各大基金会往往将巨额资金拨给受中国政府控制或影响的组织，而不是那些独立非政府组织（NGO）或者草根 NGO。由政府组织的 NGO，或所谓的 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 的简称）在为那些中国政府自己不愿资助的专案募集境外资金，同时也成了压制新生社会力量的工具”。

本文为节选，原文载于明报副刊，阅读原文请点击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2、 无法证伪的阴谋论】

徐贲：不讲理的阴谋论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

散播非理性的恐惧和仇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谣言，它经常就是人们所说的「阴谋论」和「敌情论」。这是一种极具伤害性的说歪理，其特徵是，缺乏证据，但又极难证伪。由于阴谋论说理的故意含糊，被指责为阴谋当事人的一方很难找到针对指控的反证。许多阴谋论更是根本无法证伪，因此可以非常有效地将对方置于「难以自证清白的」痛苦和恐惧境地。

”

读到一篇题为《中国最大威胁：美国文化战略及其 “第五纵队”》的文章，文章说，“就在外部战鼓擂响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也连续发生反对政府决策、质疑法律判决，甚至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歪曲解读国家政策、误导公众的事件。由于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被外资及接受西方价值理念的人所控制，其网络动员能力巨大，差不多到了任意製造舆论和绑架民意的程度。”

这样的指控听起来非常可怕， “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被外资及接受西方价值理念的人所控制”，这还了得！既然如此，作者自己的文章怎么还能出现在网站上呢？文章既然提出瞭如此严重的 “敌对”指控，那么为什么不提供坚实可信的 “敌情”证据呢？没有证据的指控就是不讲理，就是危言耸听。它不仅违背公共说理言之有理的起码要求，而且还会在社会人群里散播非理性的恐惧和仇恨。

散播非理性的恐惧和仇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谣言，它经常就是人们所说的 “阴谋论”和 “敌情论”。这是一种极具伤害性的说歪理，其特徵是，缺乏证据、逻辑荒诞，但又极难证伪。由于阴谋论说理的故意含糊，被指责为阴谋当事人的一方很难找到针对指控的反证。许多阴谋论更是根本无法证伪，因此可以非常有效地将对方置于 “难以自证清白的”痛苦和恐惧境地。



在一个谁都有可能被怀疑和判定为 “第五纵队”奸细的国家里，就像在一个谁都可能莫名其妙成为 “阶级敌人”的国家里那样，谁能免除恐惧地生活呢？苏联斯大林时代有一则这样的政治笑话：有一只俄国兔子跑到波兰，碰到一只波兰兔子。波兰兔子问：“你为什么奔跑？”俄国兔子说： “斯大林下令逮捕所有的象。” 波兰兔子说： “你不是象，你是兔子啊。”俄国兔子说： “但我没法证明啊”。 “没法证明”就是想置你于死地的人不讲理，而你却有理说不清。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生存处境。阶级斗争时代就是这样。

兔子逃命的故事在一些其他国家裡有不同的版本，说明笑话故事裡的危险不只是在前苏联才有。这类故事往往都是用动物做主角，狗、猫、兔子、熊等等。但是，也有用人为主角的。例如，在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有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个人在布加勒斯特街头狂奔，一个叫住他问：“你为什么跑得这么急？”“你没听说吗？他们在捕杀所有的骆驼。”那朋友说：“天哪！你跑什么，你又不是骆驼。”“是呀，但是他们先开枪，然后再看你是不是骆驼。”

这个故事里还是有动物，故事因此有了明显的寓言效果。但是，也有不用动物的。例如，有一个人听说，2 个以上睾丸的男子都要被强制阉割，所以他想逃离他的国家。他的朋友对他说： “你怕什么，你只有 2 个睾丸啊。”他说，“他们是先割下来再数的。”

这类故事在纳粹德国和沙皇俄国都有不同的版本。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肯尼迪纪念图书馆研究员欧米沙拉博士（Mahmoud Omidsalar）的研究发现，这个故事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的波斯文学。可见无辜定罪，先罚后查的恶劣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多么历史悠久。中国人也曾经吃够了敌情和阴谋的苦头。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被冤枉，受害者先是被定罪，吃尽苦头，饱受磨难，甚至家破人亡。然后才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有的人都死了，平反还有多大的意义？其实，割下睾丸来以后还会数一数到底是个，人死了以后弄清楚了还能平反，都不能算是最坏的情况。还有割下睾丸来数，然后硬说是 3 个而不是 2 个的。

阴谋或敌情论很容易得逞，首先是因为它富有戏剧性，许多小说、电影都以阴谋和敌情作为故事情节来增强吸引力，成为现实想像模仿的对象。在排外和敌情心理严重的人群中，阴谋论有著肥沃的政治和社会土壤，极易被操弄。

人类天生就有听信阴谋论的心理弱点，人不可能充分了解自己的生存世界，因此会对陌生的，不了解的事物抱有本能的害怕和恐惧。陌生的事物并不就一定危险或有危害，但是，将不明了的事物视为 “敌人”，有助于在心理防御上提高警觉，这是保障实际安全所需要的。敌我正邪的区分能够简化复杂的世界。对于复杂的事情，人们往往会寻找一个简单的



原因来加以解释，而阴谋论正是简单易懂的解释理论，尤其是当解释者俱有某种权威身份的时候。

歪理能造成的社会危害，阴谋论的歪理就是一个证明。然而，歪理或不讲理则又是因为社会已经遭受了某些危害和已经存在著某些危机，这才突出地显现出来。并不是因为人们普遍不讲理，人与人之间才有了 “敌情观念”，情况可能是恰恰相反。也并不是因为人们不会说理，才会冒出 “网络第五纵队”这样的阴谋论,恰恰是因为人们太容易相信这样的阴谋论，所以不意识到这是一种歪理。我们已经有过很多这方面的教训，今天应该认真汲取才是。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Maggie Koerth-Baker：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相信阴谋论？



Maggie Koerth-Baker 是 BoingBoing.net 的科学编辑，著有《在灯光熄灭前》(Before the Lights Go Out)，这是一本未来能量生产与消费的著作。

“

实验表明，那些只瞭解支援阴谋论的资讯，而对与其对立的资料一无所知的人更容易退出政治活动，他们采取行动减少的可能性也较小。政治家可能利用阴谋论来谋取选票和优势；但作为普通人宣传自己对政府机构的观点并实现民主的工具，阴谋论毫无建树。

”

数月前，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事件之后，网上关于未知肇事者或肇事者身份和动机的各种猜测甚嚣尘上。随着特萨尔纳伊夫(Tsarnaev)兄弟被指认以及搜捕行动落下帷幕，这些纷议并没有告一段落，而是改头换面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例如人们猜测：特萨尔纳伊夫兄弟只是盲从的小喽啰，受人陷害充当了某个跟高层有关系的神秘沙特人士的替罪羊；也许他们是无辜的，但爆炸案的真正元凶不是沙特人，而是美国政府某个素行不端的分支部门；又或者，这些袭击确为特萨尔纳伊夫兄弟所为，但他们也只是奉某个更庞大的秘密组织之命行动？

虽然这些说法听起来荒诞不经，但它们的传播者都相当理智。最近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如果在你眼里其中某一论调不无道理，那么说不定你也会觉得其他的说法并不离谱——即使它们彼此矛盾。而且，有很大的可能，除了这条新闻之外，还有很多别的报道都让你感觉在重大的全球性事件的背后，仿佛有幕后黑手在翻云覆雨。

“要预测一个人是不是阴谋论的信奉者，最好的方法是看他是否也相信别的阴谋论，”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从事阴谋论信仰研究的心理学教授维伦•斯瓦米(Viren Swami)说。心理学家们解释道，这是由于阴谋论并不是针对某一单一事件的反应，它更多地表达了全局性的世界观。

正如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那本出版于 1965 年的影响深远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所写，阴谋论是这个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消遣，在涉及某些好惹是生非的外国人时尤其如此。美国人总是暗自



猜疑别人要对自己不利——这个“别人”可能是共济会会员、天主教徒，也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但近年来，每次有悲剧性事件发生时，网络上关于“假旗”(false flag)攻击和“危机演员”(crisis actors)的传闻都会铺天盖地——不是单纯地提出某个说法，而是就事实是否存在着迥异的另一个版本而展开辩论。

自从霍夫施塔特著作出版后，我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已有大幅改善，这或许会令你以为它将有助于减少这种捕风捉影的猜测。然而，根据该领域内最新的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可能，它不过是增强了阴谋论对公众的说服力而已。更令人惊讶的是，阴谋论的参与者并不仅限于社会边缘人士。那些绘声绘色的叙述表明其作者具有神智健全的头脑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甚至某些最荒诞的阴谋论也可能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都加剧了阴谋论的危害性。请想一想：根据费尔里•狄金生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有 63%的美国登记选民至少相信一个政治阴谋论。

虽然心理学家无法确知我们的头脑究竟如何运作，但他们已通过调查和实验室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与阴谋论信仰密切相关的特质。2010 年，斯瓦米与共同作者在科学期刊《心理学家》(The Psychologist)上对该研究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阴谋论的信徒更可能是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在政治层面持愤世嫉俗态度的人（这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惊讶）。此外，阴谋论在自我价值感（特别是对世界政府机构的总体观感）较低的人中比较有市场。人们似乎是将阴谋论当做了一种应对不确定性和无力感的方式。

经济衰退、恐怖袭击和自然灾害都是随时可能袭来的巨大威胁，但我们对它们何时、如何发生及其后果都无能为力。在这些被无力感和不确定性主宰的时刻，脑中一个名为杏仁核的区域就开始活跃。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科学家保罗•惠伦(Paul Whalen)表示，杏仁核基本上无法独立发挥作用，相反，它会发动其他脑区进入过度分析状态——反复评估信息，企图建立一段连贯易懂的情节，从而理顺刚刚发生了些什么，仍然存在哪些威胁，以及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上述解释有助于理解在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后，脑部编造“新故事”的能力如何导致美国出现了如此多的偏执现象。

“如果你掌握着其他人不知道的真相，你将可以借此重申对政府机构的观感，”斯瓦米说。自己挖掘真相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即使这类“研究”并非无懈可击，也不会影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美好感觉。

令人惊讶的是，斯瓦米的工作还发现，阴谋论的建立与民主准则获得大力支持有关。但是，考虑到其前因后果，这也不足为奇。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历史学家凯瑟琳•奥姆斯特德(Kathryn Olmsted)说，只有在本就存在真正阴谋的世界里，阴谋论才会有容身之地。而真实的阴谋——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往往涉及对民主进程的操纵和规避。甚至在那些认为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枪击案实际上是



演员们上演的一出戏码的人中，辩论的焦点也在于《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的保留与否。

不幸的是，在这个可通过谷歌搜索迅速解决此类争议的时代里，我们并没能充分获取高质量的信息。事实上，互联网还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是指对可支持自己已有观念的证据更为重视的倾向，这是一种世人共有屡见不鲜的人性弱点。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已经反复地给出了证明。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发现，确认偏误很难克服，无法简单地通过灌输大量事实来纠正。

2006 年，政治学者布伦丹•奈恩(Brendan Nyhan)和贾森•雷夫勒(Jason Reifler)发现了一种名为“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的现象。他们指出，那些致力于澄清不准确政治信息的努力反而会让人们更加坚信那些虚假信息。奈恩无法确定为何会发生这种效应，但是，当不良信息鼓吹的是某一受欢迎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时，该效应就会更加普遍。

斯瓦米说，如此一来，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就助长了偏执的延续。除了更多地接触此类论调会使人们更容易相信阴谋论外，互联网的“站队”倾向对本已受到误导的观念也有巩固作用。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认定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协助策划了 911 恐怖袭击或许会让你“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但它并不会真的让你更强大。今年早些时候，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心理学家卡伦•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与一名学生共同发表了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向参与者们灌输了关于气候变化和戴安娜王妃之死的阴谋论。结果，那些只了解支持阴谋论的信息，而对与其对立的资料一无所知的人更容易退出政治活动，他们采取行动减少碳足迹的可能性也较小。

电台主持人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借助散布阴谋论而声名大噪；政治家也可能利用阴谋论来谋取选票和优势；但作为普通人宣传自己对政府机构的观点并实现民主的工具，阴谋论毫无建树。它甚至可能具有危险的健康影响。例如，研究表明，那些相信艾滋病是政府向他们施放的武器（塔斯基吉实验的恶行仍历历在目）的非洲裔美国人采取有保护性行为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如果你相信政府或企业都在隐瞒那些表明疫苗对儿童有害的证据，你就不太可能让你的子女接种疫苗。而其结果就是：在儿童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麻疹、百日咳感染和一些死亡集中发生。

心理学家尚无法确定究竟是无力感导致了阴谋论，还是反之。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当前的科学思维表明，这些信念无非是犬儒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对政治和传统媒体的疏离——而这只会让问题持续下去。



Maggie Koerth-Baker 是 BoingBoing.net 的科学编辑，著有《在灯光熄灭前》(Before the Lights Go Out)，这是一本未来能量生产与消费的著作。

本文最初发表于 2013 年 5 月 26 日。

翻译：任扶摇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3、走向“内因”】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讲座教授

陈韬文：外因化是打压占领运动的基本框架

“

本地及国际传媒都倾向把运动看成是自发的，所强调是中国和香港的内部成因。对比之下，外因化则是中国大陆传媒及本地左派传媒所採取的主要框架。所谓外因化，就是把成因归结到中国和香港社会系统外部。佔领运动爆发不久，中央传媒及个别领导人就已经对佔领运动逐步定性为外力颠覆的结果。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外因的主导性之前，我们应该科学一点，认真探究引起运动的内部成因，这样对运动的认识才能接近真实，才能从中有效总结，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

”

框架分析是传播政治学近 20 年来较受注视的理论和方法。所谓框架，是指传播者透过资讯的选择和强调对事物的概括描写。框架是我们沟通时省时省力的必要手段，也是我们诠释和理解世界的根据。新闻是关于新生事物的报道，自然适用于框架分析。在各类事物中，社会运动更具争议，这是因为社会运动框架往往是各种社会力量拉扯争持的结果，是以不少学者皆以框架分析来研究社会运动与公共论述的关系。

归因是为运动定性的基础

占领运动发生至今已有 1 个多月，当中衝突此起彼伏，至今尚未解决，仍然受到国际、大陆及本地传媒高度的关注。在对占领运动的新闻框架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是归因问题。什么原因导致运动的产生，其目的为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提问，也是所谓 “定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对应的态度和方法自是应运而生。



无论是从运动形态和规模来说，占领运动相信都大出各方意料，远远超乎占中三子的想像。虽然本港的商业媒体有不同的政治取向，但是从它们早期的报道和分析来看，它们大体上还是强调运动的自发性，肯定学生争取民主的目的。这里所说的自发性，也包括偶然性，是指政府最初对政总抗议者的孤立策略，把前去声援的市民堵塞在海富中心和政总附近，引致人群倒流入夏悫道和干诺道中，警方继而向聚集的人群发放催泪弹，最终激起民愤，引来更多的占领者和社会同情。凡是对学生、占中三子有认识，并对现场动态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以上种种不是任何人所能部署计划得来的。自发性另一个表现是参与者是否经由组织动员而来。笔者后来对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做过现场调查（详细结果容后发布），发现大部分参与者确实是透过朋辈网络动员或个人自发参与的。运动的目的虽然可以细分，但是大项则十分清楚单一，就是要争取更大的民主，即是包括候选权平等的“真普选”。

口实多于真实

本地及国际传媒都倾向把运动看成是自发的，所强调是中国和香港的内部成因。对比之下，外因化则是中国大陆传媒及本地左派传媒所採取的主要框架。所谓外因化，就是把成因归结到中国和香港社会系统外部。占领运动爆发不久，中央传媒及个别领导人就已经对占领运动逐步定性为外力颠覆的结果。其实，外因化的做法在占领运动发生之前已经埋下伏笔，见诸中国官员及白皮书对外国势力对香港政改 “指三道四”的指摘，并且多番强调政改要联同国家安全一起考虑。占领运动爆发后，中央透过《人民日报》评论员和中央要员表示占领运动的目的在于夺权，是颠覆中国的颜色革命，示意西方乃幕后黑手，甚至认为走向港独是运动的最终阴谋。

不同的框架有不同的说服力，主要视乎框架是否具有实证基础和符合公共论述逻辑。如果我们以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传媒外因化的框架，它们大多是指控式的，缺乏有力的证据和论述逻辑。至少，它们是强调一点不及其馀。目前的 “证据”大体上是指美国一些基金会对民间团体的资助、港人与美国官员及前官员的交往、部分西方国家对香港民主的口头支持、个别人士对民主党派的资助等等。从香港自由的角度看来，这些 “涉外”活动都是合理的、正常的，不构成任何主导占领运动的成因。特区政府一向倾向把占领运动看作是部分激进市民争取民主的集体行为，但是随着中央外因化加快的步伐，梁振英最后也表示占领运动肯定渗透着来自全球各地不同国家的外力，箇中详情到适当的时候才会透露。外国势力有什么石破天惊的阴谋，这些还有待特区和中央政府 “举证”。到目前为止，外因论更多像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反射性投影、是吓唬别人的手段，是为政权可能 “亮剑”的舆论准备。



内因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央传媒和领导人现在强调外因对占领运动的作用而轻视内因。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外因的主导性之前，我们应该科学一点，认真探究引起运动的内部成因，这样对运动的认识才能接近真实，才能知所应对，最终才能从中有效总结，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港英政府当年遇到重大社会衝突，包括 1967 年左派暴动，它都能认真总结，从而就香港的社会问题对症下药。数十年前的殖民地政府，尚且懂得内因是造成社会衝突的基本作用而有所反省，难道深谙毛泽东思想的 21 世纪的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尚有不及？这次香港政改谘询途中杀出如斯庞大的占领运动，相信也出乎中央的预期，当中应有相当严重的误判成分。如何可以减少误判？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高估外因对占领运动的作用，切实把探索的注意力回归内部因素。

原文载于明报观点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罗永生：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

我们可以见到在不同的时期，香港本土身分和本土意识都有不同的课题，面对不同的约制结构，也有著不同的「他者」，因而衍生出不同的本土身分和本土意识的形貌。而「占中运动」的历史意义，亦不在于这连串的行动能否真正争取到落实真正普选的结果，而是在过渡期／回归政治共识已经崩溃的当下，重新以公民社会、公共文化为基石，找寻新的团结基础，抵御来自内外的侵蚀力量，建设香港人的政治共同体。

”

一、前言：被动的回归

这几年间，香港兴起了关于本土意识的热烈话题，也出现了不少诉诸本土意识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兴社会运动。身分政治毫无疑问已经占据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成为决定香港未来走向一个绕不开的面向。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归」前后引起永不休止的争论，问题的根源来自 1997 香港的主权治权移交中共的整个过程中，「香港人」一直都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英国在百多年殖民统治中，均没有让香港人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体意见的机构。香港前途谈判中，中、英双方也无意让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参与谈判。基本法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收回」香港的命运拍了板之后才开始，而且所谓港方参与基本法草拟的「草委」、「谘委」，都是按中共分化统战策略的安排，而且大部分都由中方委任，谈不上可以代表香港整体的民意。

政治上的「收回主权」为香港人政治上的身分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做出了安排，但也留下很多产生矛盾和漏洞的缝隙。在文化意识上，因为中英两国均要合力营造所谓「顺利过渡」的环境，遂大力粉饰香港过去发展经济的成就，但同时也掩埋香港英治殖民的过去，企图把人们的眼光都导向美好的未来。香港殖民历史的真貌，因此也并没有得以全面的呈现，引起辩论，使人们可以做出公允的评价及妥善的清理。相反地，英国人只是努力去让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蹟发生史：英国给香港带来了法治、自由和先进的城市建设。而



中国为了安稳人心，平稳过渡，也对殖民地的过去讳莫如深，只会选择性地以「游子归乡」的悲喜剧式民族主义故事来述说「回归」。这种煽情剧的话语，在与英国人同一调子地讚扬香港经济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国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为一群「经济动物」，只是今后要令香港人懂得「饮水思源」，承认「祖国」一直以来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贡献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荣安定。

可是，香港人的殖民经验，就仅只是一个经济奇蹟发生的故事吗？香港的过去，就仅只是一个孩子由「养父」交还给「生母」的故事吗？「回归」的故事，的确是一个如此简化的一齣煽情剧，而殖民主义就真是如此就随之而过去了吗？

真正彻底的解殖过程，应该是从殖民结构下解放住民们被压抑剥夺的独立主体精神，但在「九七政治」底下，香港社会的发展被刻意地安排和设计，以保证殖民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权力结构，在九七之后一样运作顺利。因为中英双方均没有承认在这土地上生活的人，应有份参与决定自身的命运，香港人事实上是在极大的无力感和无奈底下，被动地目睹这城市的未来，为两国政府用作谈判的筹码。这种交易安排底下达成的「回归」，不可能是「殖民主义」的结束，反而是「解殖」的无限延搁。就如笔者在另文曾经阐述过的，由于香港所经历的是「被动的回归」，所以是处于一种「解殖未完成」的状态，所欠缺仍是一个建构「主体性」的过程，无论这种主体性最终是以真正的「自治」还是「独立」去体现（〈迈向具主体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国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页 14-30）。

因此，香港近年出现的本土意识和本土运动，可说是一种「被压抑的回返」，是对「被回归」命运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压抑的香港文化与政治主体精神，索还被拖欠的「承认」。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去改革这种「殖民未解」的结构，不能从历史上清理「主体参与欠缺」的状况，检讨与反思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香港人」主体成长的挣扎，我们亦无从建立香港人对自己的清楚认识，俾使香港人成为自己的历史主体，洽当地处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

二、土著绅士的香港人身分

关于香港人在殖民时代，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独特身分，以及有没有哪怕是处于萌芽阶段的本土意识，存在著不同的说法。按照英国人为自身帝国主义历史辩白的史观，香港是一个贸易商港，也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在这块土地上，重要的是货物、资金、人员的流动，因为流动而产生了各种文化碰撞。但是，这些碰撞都是流动性派生出来的，由外面带进来的。除此之外，真正土生于香港的文化，均只是不足道的地方庶民生活风俗，这些文化风俗也只有等待最终被现代性发展所淘汰的命运。



上述这种殖民史观轻忽地看待香港的本土文化，但无疑它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早期香港的人口的确存在著极高的流动性。这些从外地过来找寻工作和生活机会的人，当中包括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他们并不以香港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认他们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赋予他们公民权责。而中国历任政府也刻意利用这种含糊状态，不设边防，华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况与其他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识」在租界的历史环境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哪怕是有一种租界住民的意识，它都不会是一种排他和独一的归属，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认同高度重迭。租界住民的意识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会转化成政治上的能动性。

不过，香港是很早就割让出去的殖民地。英国人在这裡的治理，开始于十八世纪中，比清朝覆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革命早了近半个世纪。按历史学家 John Carroll 所指，虽然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充满流动性，却在殖民早期就冒现出一批以香港为永久居所的买办资产阶级，建立起他们非常独特的香港身分认同 。他们为英国殖民主人所信任，被委任为香港的华人领袖，除了自身参与商贸活动，也主理香港为华人服务的慈善机构，成为香港华洋两大族群之间的桥梁。他们忠诚于大英帝国，但又不会放弃自身的中国人身分，因为拥有「双重身分」正是他们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条件。他们内化了英国士绅阶层的文化价值观，鄙夷「外来」的中国人道德低下，素质低劣，他们很自觉地和低下层、来自内地的华人区隔。但他们并没有彻底地在生活上「去中国化」，因为在英国式「间接统治」的殖民体制内，他们是「华人代表」。他们会为华人生活风俗习惯辩护，修正或抵挡英国人或其他洋人提出的改革诉求，例如按西方标准来提升华人居所的卫生水平，及以性别平权的原则禁制华人收养婢女的制度等。再者，这些「高等华人」之效忠于大英帝国，也毫不与他们投身或支持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有所扞格。也就是说，这些拥有独特「香港人」身分的买办阶级，可以毫无困难地同时是中国的「爱国者」，参与不同时期的中国国家建设。当然，在民族主义走向激进化的时候，他们的「双重身分」也会为他们带来麻烦，被民族主义者指责为不中不西的「汉奸」。

民国初期，中国大陆政治混乱，部分香港华商也卷入中国的地方派系政治。后来国共相争开始恶化，中国民族主义日趋激烈。在 1925-26 年的省港大罢工中，香港买办资产阶级更紧密地站在打击罢工，维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因此，香港的买办阶层也开始与来自国共两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为敌。而自此之后，香港高等华人的政治保守性格亦牢牢地与殖民体制紧扣在一起，成为香港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勾结式殖民结构」的一部分。

回顾这些殖民早期买办阶级的「香港身分」历史，对了解历史上的「中港关系」其实十分有用，因为虽然这班华人精英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对型塑香港的政治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他们是非常忠诚于大英帝国的土著绅士，接受优良的英语教育，对英国帝国文明下的法治制度、自由主义精神心仪嚮往，他们也不断努力把这些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



把这些价值观纳入他们改革中国的蓝图内。但是，他们却只能在一个殖民体制下取得荫庇，不能充分地发展成一种欧洲启蒙时期带领自由主义革命运动的，具有远大政治使命的资产阶级。所以，虽然 John Carroll 指出了他们之间分享著一种共同的资产阶级文化，主动地将自己和周围的其他中国人区隔开来，也有别于其他国籍背景的有财势阶级，并且积极地追求英国承认他们独特的香港身分，但实际上，他们的买办性格使他们和启蒙时期欧洲的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因此之故，他们也无法超出优势阶级的局限，去建构一个包含各阶层在内的本土运动，也无法像在印度，把自己改变成反殖民运动的精英。他们孕生于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后，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年代，当时英帝国热衷于透过香港培养具英国文明素养和技能的华人去帮助改革清朝政府。香港的买办阶级很早就懂得利用这种在两大朝廷之间穿梭往来的能力，来建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并从这种在两大帝国夹缝之中游走的经验，塑造了自我的形像，并如此地定义香港独特的身分认同。他们非常著紧于要英国人承认，他们是有别于「其他华人」的「大英子民」。他们内化了大英帝国的文化价值，也透过这套价值观去审视中国在那个时期的种种弊端，进而把自身放置在帮助「改革」中国，为中国输入西方现代文明的计画当中。他们会猛烈批评中国状况，但这不妨碍他们自视为深爱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但亦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著力于建立与中国完全区隔的香港本土意识，建构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善于与强势的外来统治者打交道，政治上长期寄託命运于保护他们阶层利益的殖民体制，政治认同上的双重性也发展出以实用主义为外表的依从主义、甚至投机主义。这种「识时务」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香港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份，也是日后香港走上「被动回归」之路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三、难民社会与民主自治

香港出现真正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本土意识，始于二次大战。中日战争使香港再度成为外来人口大量涌进的地方，但香港在 1941 年也沦陷在日本人手上，直至 1945 年日本人撤出。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内战，以及中共建国初期不断的政治动盪。香港政府为了管理一个庞大的「难民社会」，也承继日本制度，实行人口登记，发出识别香港人身分的「身分证」，但对入境人数仍无限制。直至六十年代，大陆发生饥荒导致漫山遍野越境而至的难民潮，殖民政府才开始实施较为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国内地人士再不能随意随时移居香港，违者会被遣返内地 。

当初日本人在香港实施「身分证」制度，是因为要配给米粮和监控人口。所以「身分证」并不自动等同明确界定的公民权责，也与人们当时的「身分归属」感并不完全相应。相反地，当时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视为内地来港的移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香港。当时已迁



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也视居港华人为「侨胞」，而按中共政府对香港「充分打算、长期利用」的政策，则视香港为「尚未恢复行使主权的领土」，居住在香港的都是「香港同胞」。在东南亚等地，因为英国决意撤退，终结殖民统治，当地土著族群的民族主义急速发展，令华人惶恐不安，四处迁移，这些局势也为香港带来大量的临时人口。

由于社会上充满大量的移居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土地上，令人关注的并非本土政治，而是在「冷战」支配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势力之间的政治角力和斗争。不少论者将这种两派角力视为国际上两大阵营「文化冷战」的延伸，但这只是说出了实况的其中一面。因为无论是英国统治者还是冷战中居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都没有把香港变成冷战中一边倒地反共的地方。英国既没有在香港强加一套明显的文化政策的传统，也一贯地维护殖民商港政治中立性的「非政治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要透过香港维持与新中国的良好关系，方便英国在远东地区部署自身在战后的长久利益。所以，一方面香港旧有的华商阶层仍然可以公开展示他们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但香港一样可以容许各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互相竞逐。而左、右两派被高度政治化地组织起来的支持者，不时将他们之间的斗争上升为暴力殴斗和暴动，与警察发生衝突。但是这些暴动与本土意识的关系其实极其淡薄。

可是，这并不表示战后香港不曾有人试图建立自身身分的力量。事实上，战后香港的华商中间，以先施百货少东马文辉为首的一群香港华人精英，连同一批受左翼思想或费边社改良主义影响的外籍人士，包括知名的叶锡恩、贝纳祺等，就积极针对殖民地政府的不良施政，成立议政及行动组织，包括「革新会」和「公民协会」。这两个组织成为香港战后初期主要的民间反对力量。虽然，它们由于取向基本温和，也未能完全深入以难民为主的社会基层，所以发展受到很大局限。这些以香港为家的华洋精英，打破了过去乏人关注香港本地政事的消极状况，公开要求香港施行更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进行民主化。

他们意图反映香港民情，以独立民间的身分向香港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在中西报章发表批评施政的文章，又直接向英国国会投诉殖民地政府的不善施政，频频往伦敦揭露香港实况，令香港殖民政府受到不少来自英国祖家的压力。这些压力团体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后，更发展成为一股组织政党之风。他们分别组织过诸如「联合国香港协会」、「民主自治党」、「工党」、「香港民主社会党」等组织，也策划过一些基层商户抗议、小贩抗争和其他示威活动。1961 年联合国香港协会提出全面普选立法机关的要求。1963 年，该会转化为「民主自治党」，提出既反殖亦反共的纲领，追求英国给予香港自治，及由香港人出任总督 。这些不落入国共两派对抗的，以市民权益为本，以民主自治为主要理念的政治活动，相比于由亲国民党右派或亲共产党左派所组织的群众暴动或工潮，显得十分温和。但在殖民政府眼中，这些同样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因为相对于左、右两派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活动直接针对殖民政府，因而也受到殖民政府密切的监视。



可是，这些由本地华洋精英分子组成的政治运动，并未能像当时的左、右派民族主义组织一样，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间进行组织，又因为内部很多领导风格和路线上的分歧，所以频频分裂。不过，他们的抗议行动与改革的呼声，也唤起了香港市民对本土政治的醒觉，这些努力间接地诱发了 1966 年反对天星渡轮加价的抗议，以及往后的「中文运动」。反天星渡轮加价的示威，是香港首次出现的本地自发抗争，但因为缺乏组织，最终也失控而引发了暴动，招来殖民政府的强力打压，引起保守派的巨大反挫，也波及到叶锡恩这类温和派。而在当时高度专权的殖民地架构下，也著实没有让这些立意植根于本土的民主自治主义者有选举参政的平台 。况且，民主、自治这些理念，在一个以「非政治化」策略为管治手段的殖民政府，及那个散乱及内部派系倾轧非常严重的「难民社会」中，也显得左右为难，相关的机构和政党在七十年代之后亦失去活力，无疾而终。

六十年代香港首次出现的自治运动所依据的价值是人人平等，具有自决权利的联合国精神及背后的一套普世价值。可是，这种具国际视野和世界主义精神的民主自治理念，既反对殖民主义，也反对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但它在五十年代左右派冷战对立的环境下未能脱颖而出，也不敌继后在香港兴起的左翼激进主义，其功绩也被往后在青年人中间流行的新的左倾的民族主义热情所盖过。

四、婴儿潮世代：本土意识第一波

事实上，土生土长的战后婴儿潮一代虽然有著一种强烈的「以港为家」的愿望，但他们成长过程所接受的薰陶，主要还是来自父母一代的难民意识。而最能表达这种难民的飘泊命运情怀的，要不是左派的「北归」主张，就是「右派」以海外作为基地，静候未来重返大陆，推动文化复兴的寄望。在这些「右派」文化民族主义者中，「新儒家」致力中国文化教育，影响至大，吸引不少香港青年认同。但自从出现了 1966 及 1967 年两次暴动，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理想便显得过于虚玄和不贴现实。这些土生青年一代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社会现实，不再像上一代沉溺于飘泊「海外」的悲情。因为他们这一代认定要以香港为家，香港也是个让他们成长和生活的社会。所以，他们对身旁发生的不公义和社会上普遍的政治苦闷更为敏感。

六十年代末期是香港土生土长一代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体性的时期，这一代人成长于一个由英国人殖民统治的香港，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只有朦胧或支离破碎的认识，但甚少有实际的感性经验。他们在政府学校裡，接受的是非政治化和非历史化的教育，因为殖民政府非常忌讳历史教育会让学校变成宣传不同派别政见的温床。香港土生第一代大都受益于六十年代急速的经济起飞，另一方面也目睹急速经济成长下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不公义



的状况。在认知上，他们既对殖民统治怀有不满，也对「文化冷战」下二元对立的意识型态困局产生厌倦和怀疑，很渴望可以从这些窠臼中挣脱出来。

1966 天星码头的群众自发暴动中，新一代没有组织起来。但在 1967 年亲中共的「左派」暴动中，却有高度的组织和完整的政治口号，而且因为深受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的影响，诱发事件的虽然只是劳资纠纷，但很快便上升至诉诸暴力手段，挑战整个殖民政府，左派甚至出现要求中共立即收回香港的呼声。这种急剧激进的政治主张，虽然随暴动的失败而退出历史，但已使年青一代深受震盪。他们虽然对亲中左派的政治主张一知半解，也只有小部分是由左派组织所鼓动而加入这次暴动风潮，但大量青年围观示威，向警察叫骂，使所有人都感觉到，青年人中间存在著很大的躁动与不安。他们心中的巨大问号是：「香港往何处去？」

的而且确，在继后整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社会运动风潮，使人们习惯描述这段时期为「火红的年代」。这个年代所涌现的政治及社会运动，是以青年一代为主体的。比起战后初期的「冷战式」对抗，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风潮，更有独立性和本土一代的自主性。虽然，这些运动仍然与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千丝万缕的複杂关系。但是，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社会运动，是独立于传统左右两派的第一次本土政治社会运动，所以也萌生出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识」。

例如，七十年代初「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把矛头针对港英政府的「重英轻中」语言政策。这项运动成为 1967 暴动后青年首次有组织的和平社会运动，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及后发生了「保钓运动」，批判美国和日本「私相授受」钓鱼台岛屿。但也因为政府强行以武力驱散集会而使运动添上反殖民主义色彩。这两个运动同时都展现了一种香港本土意识在萌生的时候，如何面对殖民主义现实的问题，以及在运动中如何重新协商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方面，由冷战对抗所主导的那一种（反共的、否定今日现实[红色]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能让这些本土一代回应急剧转变了的现实，本土一代要打破这些让他们没有行动力的旧民族主义思维。但当他们要回应香港压迫性的殖民现实，他们也只有诉诸华人利益（中文）和中国人身分（保钓）。这种经过重新定义和协商的民族主义，促使他们这个世代，打破了过去的政治冷漠和「无根」心态。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识」便是在这複杂的文化与政治地貌下出现。

五、火红年代与香港归属感

「保钓运动」的其中一个后续方向，是脱去右派文化民族主义的反共精神，把祖国情怀重新嫁接到亲共的民族主义，发展出新一代的亲中共「国粹派」青年。但对中共较有批判性的学运青年，则把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后激发的关心社会热情，凝聚成深入社区基层，争



取改善居民权益的居民运动，使香港首次出现了深入到香港本土社会基层的政治运动。他们自我划定为学运当中的「社会派」，他们介入基层社区的实践，上承了叶锡恩等老一辈的本地改良主义社会改革传统。在这第一波「本土意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在殖民体制底下，本土意识的萌生需要直面殖民主义的现实，不能诉诸无处落实的中国悲情，但既然要挑战殖民主义，也仍要寄託于某种中国民族主义的华人族群意识。

在落实为究竟是要直接投入现实中的「红色中国」，还是介入香港本地的反殖民斗争的问题上，学生运动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和争论。1976 年四人帮的倒台使「国粹派」在社会运动中消失。而「国粹派」盲目认同中共的错失，也激发了学运的后继者对中国民族主义更彻底的批判。七十年代中期的激进派社会运动，由托洛斯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推动。他们把学生运动及社会运动的视野推向全球，超越国族。而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及「反文化」运动，也以稍微滞后的方式大量引进香港。香港青年一代也在这个年头受到台湾的自由主义反对运动、中西文化论战、乡土文学论战的影响。而文革末期极左派红卫兵逃港，揭示了文革的阴暗面，也传播了一种有异于官方毛泽东主义的另一种激进批判。从这些异类的激进主义思想资源中，香港新一代建立了一种重新审视现实中国的视角。

在这个既有意识型态急速崩解的年代，如何重新理解香港应面对中国，及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思考香港的位置与角色，成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大思想挑战。受到七十年代末「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与魏京生所提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的主张影响，香港新一代修正了纯属感性的中国认同，也抛弃失败了的意识型态，但仍期望以更有批判性的方式自我定义为可以藉香港的特殊地位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这种複杂的中国认知一直延伸至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正式进行的谈判，影响了部分积极分子，以支持「民主回归」的方式面对中国在 1997 年要收回香港主权的现实。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殖民主义没有维持下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香港人也担心共产党的专政会破坏香港，在没有其他更有实现可能的另类选择底下，用建设民主制度来保障香港的未来发展，应是最佳的选择。而本地民主的发展，也正好可以平衡甚或克制过往殖民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公义，发挥香港人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的主体参与精神 。可是，无论是否赞成「民主回归」，在八十年代初面对香港前途危机时的本土意识，其实都十分薄弱，无论哪一种主张都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行动力。民主回归只是少部分论政团体的观点，除在大专学界较有热烈讨论之外，在社会上并无广泛回响 。而其他立场的论者，包括维持现状、联合国託管、主权换治权论、续约论及零星的香港自决论，除了以文章抒发意见，都没有推动过很有组织规模的集体抗议行动。归根究柢，香港人当时还是活在殖民政府竭力维持的高度的「非政治化」状态之下。而且，虽然大部分香港人当时都对中共「收回香港」深有恐惧，但对于香港华人的「中国人」身分，香港原来是中国拥有的地方，都绝少提出彻底的质疑。



事实上，在整个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也努力建造一种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识」，来面对 1967 年暴动之后暴露出来的社会危机，和政府与市民间之间广泛出现的疏离感。最近的研究也证明，七十年代初英国已经判定香港最终要交还中国，所以开始积极准备「非殖民地化」政策。殖民政府较从前更积极主动地建立这个晚期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例如推行廉租屋计画、新「卫星城市」的开发、建立廉政公署切实剷除贪污等。而与此同时，政府也不时通过提供集体娱乐节目，如「青年舞会」、「香港节」等，强调建立「香港市民」的「归属感」。可是这种「香港归属感」虽然有意建立一种有别于中国的城市市民身分，但也小心翼翼不去让香港人萌生香港人是「英国子民」的感觉，因为当时英国已决意防止香港人将来以英国国民身分大量移民去英国。

而为了减低殖民地社会内部华洋族群矛盾，殖民政府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减少洋人占据政府领导职位的数目，提供本地华籍公务员担任部门最高职位的机会。这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并没有触动殖民地的基本统治架构，只是在「谘询式民主」旗号下舒缓社会的对立，更遑论承诺建立具市民认受性的民主自治政体，但已对推动香港成为一个有别于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奠下基础。问题只是，这项准备英国人「光荣撤退」的工程，香港人是在不被知会，也没有权参与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推进的。香港社会只是在有限及被框定的范围内建立起对这城市的「归属感」，但却无法通过任何正式机制去表达出自己的集体意志。所以，这也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英国人离去」的「晚期殖民」计画。而这个打造「香港人身分」的计画，是刻意地以「非政治化」的政策，将香港人型塑成一种只顾经济成就，不理政治的经济动物，并由此而为「香港身分」做定位。事后证明，这种非政治化的香港归属感，最「成功」的地方是令香港前途谈判出现之时，香港人都失去了自发参与的行动力，任由中英两国摆佈 。

六、大香港主义与「比中国还要中国」

当然，按照民族主义者的理解，「香港人」这身分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香港的华人都应该是中国人。这是当时社会上左、右两派都分享的共识。可是，七、八十年代急速地在香港发展的流行文化，却积极地参与塑造一种具备本土特色的，有异于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国家认同的本地文化。只是这种本地文化所承载的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明确寻求政治自主的意识，而是充满政治上的不满，但又对政治往往无奈的「小市民」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一面嘲弄政治忠诚及道德文化上的严辞伟论，但又承载了很多对现状的不满，并且在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小市民式的自豪感。塑造这种小市民意识的最大力量，莫过于当时刚刚引入的无视电视广播。以香港「无视电视」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的综合娱乐节目「欢乐今宵」为中心，电视工业快速地成为七十年代型塑香港人意识的工具。一方面，以



抒发民怨为目的「讽刺时弊」，塑造了某种香港社群的共同体想像，但政治上的集体意识又被节目中娱乐的形式及内容所迅速置换。它一方面将当时相当缺乏的电子公共舆论平台，安插入娱乐节目，吸引观众产生共鸣；但另一面又以娱乐节目的形式，消解公共事务讨论所产生的衝突。调子是歌颂好人好事，经济成就，不断强调香港人以安定繁荣为最高价值。它安排了每晚百万观众的生活节奏，以馀暇消融政治，与殖民政府以非政治化的经济动物为形象建立的香港归属感相互配合。

不过，这种以大众文化为本的本土文化，也渐渐扩阔，包含其他形式和潜力。一方面是充满感官刺激的大众电影、杂志之类的商品文化，但另一方面，这种环绕庶民生活来建立的普及文化，也反映了香港生活的独特感性，包含著香港城市能汇聚各方文化资源的驳杂特质。不过更重要的是，新的香港普及文化，渐渐脱离了来自传统中国，及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大中国想像。香港发展出独立于两岸中国文化想像的香港本土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香港电影市场上国语片与粤语片的市场份额此消彼长之上。七十年代行销东南亚各地华人市场的国语片，大半的製作充满中国文化的内容，民族主义的意识。它们挟其规模製作、先进科技的优势，一度雄霸香港电影市场，淘汰了以旧式道德教化为内容，以本地广东话族群为观众对象的粤语片。可是与香港生活实况息息相关的粤语电影，透过八十年代「新浪潮」及走普及路线的「新艺城」创作，重新反攻电影市场，最终取代了国语电影，使电影院成为型塑新一代的时代及城市感性的基地。新的香港电影重夺香港电影市场并行销海外。这标志著一股强有力的本地文化浪潮，在八十年代渐渐迈向高峰。这个巨大的市场逆转，标志著战后婴儿潮一代，大肆展现及巩固他们这一代的本土意识。可是，这种本土意识在萌生出一种在家国之外的独特城市文化视野之馀，并没有在「城市经济人」之外孕育出更有明确政治价值的香港身分。相反地，这时期的本土文化所建立的，大体上是一种「小市民意识」。它对香港人的灵活、机智、不墨守成规等小市民性格的歌颂，逐渐建立了一个新的香港人自我形象，以「经济人」身分、功利主义和实利主义而建立自豪和自信。

当然，这种对香港生活和香港人自身充满自信的年代，亦是香港在七十年代金融投机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局势变化的产物。因为 1976 年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中国走上开放改革之路。社会主义神话破灭，港式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变成一种被证明「成功」的意识型态。香港一向奉行资本主义，并取得战后繁荣成果。中国在八十年代回过头来要重新引入资本主义，显得香港已走在中国之先，并可以反过来成为中国大陆要南下吸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地方。穿越过去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长的受中国民族主义及反帝意识型态支配的岁月，香港在八十年代好像重拾了它的传统角色，回到旧日由双重效忠的买办主导的年代，站在领先的地位去为中国的开放改革服务，但亦同时从中赚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八十年代高度发展的本土意识也是以经济为主轴，形成为一种带高傲心态的



「大香港主义」，视大陆人为文化相对落后的「他者」。和早期殖民主义时期一样，这种香港人身分也是毋须与中国切割的，因为它不会被视为与中国人的身分互相排斥。

政治上，八十年代初前途谈判曾经一度带来香港人的恐慌，但「一国两制」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因为当时中共高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将来会作为对台湾起示范作用的「示范单位」。这亦使得八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识」与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殊部分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不矛盾。1989 年的六四悲剧虽然打破了这一波本土意识中中国与香港关系在想像上的完美平衡，但「六四」强化了的并不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香港本土意识，反而是加深了不少香港人心中的民族认同，认为中国与香港命运一定是连成一体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创伤不单只是中国的事情，更具有不可忽视的本土意义。这种本土意义并不全然在追求民主的目标，而是为当时不少香港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也提供了一种关于香港身分的叙事，恰好针对著过去香港身分中那份「政治」缺席的无力无奈，港人经济动物形象的自夸与虚浮。这种透过活得「比中国还要中国」，热切地想参与改变中国的政治热情，虽然在六四震盪的几年后逐步消散，但它的馀温仍然维持，支撑著香港支联会每年主办六四悼念，直至今日。在这裡，我们也可察觉，香港本土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过程中，与中国因素的複杂和纠缠关系。

六四是把香港人从殖民地型塑的政治冷漠、五十年代难民心态和七十年代经济动物意识中唤醒过来的重要时刻。如果说任何历史主体性的形成，一定要透过一个创伤性的集体经验，以激发一种有道德意义的集体团结感觉，俾使社群团结能超克自利无根的飘泊个体，那六四就是香港历史主体型塑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以某种中国人身分认同为激发点，但因为香港是唯一一个能够将毋忘六四坚持作为自身使命的地方，六四记忆就成为孕育本土政治意识成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有了它对「香港人」身分的特殊意义。当然，因为八九民运毕竟是一个香港人以「支援者」身分参与的运动，六四悼念也在香港面对 1997「回归」的过程中，以某种「异见式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呈现，局限于展现香港作为中国不可降服的「内部批判者」的策略，有自我羁绊于某种「大中华情意结」的倾向，但它并无碍于香港人自九十年代开始，重新审视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香港文化主体性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

七、香港即世界：本土意识第二波

在整个九十年代，与上面所说的这种批判性的民族意识一起出现的，也是香港人对自身社群命运的一个巨大的疑惑及警号，因为六四发生在 1997 年之八年前，当时香港人正快速地迈向「告别英国」/「成为中国人」的那一天。当六四屠杀发生的头几年那些凝重的日子过去了，文化界就爆发一波反思、探索及巩固本土文化的热情，和对香港身分的严肃思



考。无论在创作成果还是理论探索方面，关涉本土文化过去未来的议题和讨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当时这一波探索本土意识的热潮，对香港文化和香港身分最为一致的态度就是拒绝大中国民族主义对香港历史和文化的贬抑和轻视。从引入大量的「后殖民」视角来评价创作，到自豪地肯定香港文化的混杂性；再由自我确认香港文化的城市特质，对「边缘」视角的认定，到对香港式普及文化的反抗及颠覆潜力的讚许等等；文化界对香港文化的回顾与反思，其实都是一种对君临香江的未来中国势力一种强烈的反弹。在这个时期，本土意识被认定为是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所应具备的世界主义性格紧密地连结起来的，所以，保卫本土文化精神，也就是保卫它的开放性、多元性、跨国性和反思性。因为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只有保持香港的跨国性和开放性，解构民族主义的大论述，免受民族主义的权威所吞噬、消灭，方能使香港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回归中国之后也得以保护和继承。相呼应的是，除了政治上强调要全面在香港落实普世价值，也要加速建设多元、活泼的公民社会，加强公民教育，保障新闻自由、学术自由。

很明显，在这种可以称为第二波的「本土意识」追寻中，本土身分是相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而建立的。这一波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和评论，首次地针对中国和香港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做出批判性的检视。香港「中国人」的身分首次被评论人从旧有的政治民族主义，甚至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中抽离出来，拒绝接受将香港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也拒绝用中原文化的标准来贬抑香港文化。对香港文化的肯定，也展现在否定再用「文化沙漠」、「中西文化交汇」这些古老的陈腔滥调去表达香港。

在否定用大中国观点去评价香港的同时，香港文化界也警惕和批判来自大陆的中国学者，试图以中国中心的观点去为香港编写历史，强调香港学术界要发展以香港为书写主体的批判视角。可是，究竟何谓以香港为书写主体，何谓香港人史观，也引起质疑和讨论。一方面是对本土视角的迫切需求，但另一面也是对何谓香港「本土性」的无尽问号。在这个问题上，九十年代参与这些讨论的香港学者，并不标举一种封闭的、本质主义的、或原生主义的本土观。因为他们也警觉那种本质主义的本土观只是他们希望批判的本质主义中原文化观的倒映，也认识到这种本质主义的本土观与香港的历史经验并不吻合。他们在肯定本土性不应屈从于中原中心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同时，更重视香港文化如何有创造力地积极利用其「边缘性」、「夹缝性」和「跨国性」，他们更重视的是香港文化的「多元性」、「混杂性」和「颠覆中心思维」的潜力。他们小心翼翼地既肯定亦批判香港的「国际性格」、「商埠特质」、「双重意识」甚至「买办传统」。方法上，他们借助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解构民族主义的中原中心霸权，但也诚惶诚恐地自我批判欠缺自省能力的本土主义或大香港主义。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充满形形色色、多层次、及错综複杂的权力关系，各种霸权论述的狡狯和危险 。



九十年代的这波「本土意识」探讨，不单力图彰显独特的香港文化身分，更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不再停留在泛泛地罗列香港文化的特徵，更主动地分析香港文化的生成过程，与相关的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分离的关系，更以自我与他者的複杂关系，探讨香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而虽然这些探讨并没有扣连上直接的政治行动，或意识型态的主张，这些讨论和创作上的探索有著明显的时代迫切感和实践意识，亦贯穿了一种为这个城市的世界主义性格奠定论述基础的精神，也为「回归」后本土意识的发展奠定了一套基本的思路，建构了一种话语，为日后文化介入政治做了思想准备。

八、文化起义与 80 后世代：本土意识第三波

事实上，九七过渡之后，政治主权的移交已成定局，但文化仍然是一条每日在争持角力的战线。因为虽然基本法订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中共并未真正放心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而是不断运用各种力量渗入香港的各个环节，培植对其忠诚的「爱国爱港」力量，排斥对它有批判和敢发出异见的声音。基本法的设计原来已经是体现著分而治之的殖民管治原则，设置了各种关卡，以防备港人集体意志的形成，政治上有利于中共去操持香港大局。可是，由于缺乏管治认受性的政府体制先后惹来多番的政治危机，中共更日渐抛开不干预的面纱，日益明目张胆地亲自介入香港政事。可是，不满的声音未有一日止息，抗议风潮此起彼伏。建制力量认为原因是政治上虽已回归，但「人心尚未回归」。于是，文化上要做到令香港人忠诚顺服便是所谓「文化回归」政策的根源。如何透过控制传媒、掌管教育、规限学术，打造忠诚于中共政权及其政治观、历史观及其他意识型态内涵的文化环境，便成为回归后香港文化政治的焦点。第一任特首提出建立西九文娱区计画，香港的文化艺术界破天荒地投入，发动所谓「文化起义」的连串抗议，要求以地产发展主导、用文化发展来包装的西九发展计画「推倒重来」。这场运动后来更配合了 2003 年因为推行国家安全立法的「23 条」争论，为政治冷漠的文化艺术界点燃了回归后的文化政治角力。

直至 2003 年七一回归日五十万人大游行之后，香港涌现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青年人，这是一个他们一出生香港便走在「回归」路上的新世代。这个世代在 2003 年的大游行中获得了他们的政治启蒙，也感受到他们是活在一个他们没有权利去选择的不民主政治体制下。他们对作为特区新一代，被赋予当「香港的中国人」的国家身分原本没有太大异议，就算有也只是和其他年长一辈的人一样无奈接受。但对于基本法 23 条一旦成为法律，政府即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剥夺他们的自由，监控他们的生活感到十分恐惧，他们更加对北京中央多番透过「释法」打击香港落实民主改革的意愿非常反感和失望。这个世代的青年人尖锐的感受到，香港政府无论是由谁当特首，都只会听从北京的旨意行事，与他们的愿望和切身感受有巨大的疏离。

政治上的不满亦延伸至广泛的对整体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均由地产商支配，一切以发展主义主导的状况反应十分敏感。他们目睹城市的旧区旧物快速消失，邻舍关系被彻底破坏，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愈来愈没有空间，日常生活亦失去了选择。这一切令他们产生不了可以安心以此地为家的归属感。他们要说出新世代的价值选择，并主动去重申应有主体的权利去决定这个城市的未来方向，拒绝接受上一代被动的生活态度。这些上一代仅仅视香港为机会之都，以官方版本的「狮子山下」故事，来定义自己的身分认同，将本土意识简化及扭曲为纯粹为谋生而奋发拼搏，最终出头的故事。回归新世代对家园归属感的追求，构成了新一代本土意识的内涵。这种本土意识所界划的「他者」既包含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包括垄断香港政治命脉的政治经济结构、官商勾结体制、地产霸权，以及高高在上操控香港的国家机器和既得利益建制。

他们不满当权的政府，建制派的保守势力，也不满香港的政治反对派，因为这些以婴儿潮一代为骨干的反对派（泛民主派）已经僵化，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去带领有效的政治反抗运动，而是安于当一些忠诚的「泛民」小政客。所以，他们试图在既有的有限民主体制之外，突破香港政治发展的困局，透过一些比以前更激进的社会运动方式，发出他们这个世代的呼喊。他们感受到这个城市正在日益变得陌生，所以他们发自内心的，高呼要为这城市重拾它失去的灵魂和价值，在一些原来没有政客及传统社运界关心的城市建筑及环境保育问题上，打开新一类城市社会运动的缺口。从 2006 年及 2007 年的保卫天星及皇后码头的运动开始，到利东街的反迁拆，以至 2009 年的反高铁运动，香港开展新一轮（第三波的）本土意识的热潮，并且点燃了一场全新的本土运动。

这一波的本土意识追寻，明显地有著「回归新世代」，亦即由「80 后」担纲的色彩，所以和相若时间的世代矛盾讨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作为掌权者的政府官员，还是主流泛民政党在运动中的被动角色，都被青年运动参与者抨击为旧的战后婴儿潮世代的保守主义。他们以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眼光看待新一代的价值观，不了解新一代的本土意识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上欠缺流动性和「上位」（出头）机会的抗议，而是要展现一种「后物质主义」的新价值观。因此，他们并不像上一代的「泛民」政客及社运利益团体一样容易被建制所分化及吸纳。他们要突破遗留至今的殖民主义式的政治游戏，因为这些游戏只会吸纳和收编反对的声音。因为回归后香港政制为了分化反对力量，正是透过层层迭迭的所谓「功能团体」机制，以利益收买和笼络的方式让中共可以操控大局。

九、集体回忆与中港矛盾

为了动员还未被利益分化体制所收编的支持力量，这一波「80 后」的新社运还大力动员文化力量，召唤香港原来在巨大无力感下消极的怀旧情绪，转化为积极的守卫文化历史记忆



的力量。正因为香港在新旧的殖民体制下，要不是根本缺乏历史教育和历史感，就是只单向灌输一套陈腔滥调的官方历史，这使得追寻被遗忘的历史及集体回忆，变成一种开发新的政治能动性的来源。这种由文化推动的新政治得到文化界、新闻界和艺术界热烈的支持，使这一轮本土意识的推展十分迅速。「80 后」以重写殖民历史记忆作为社运动力，逆官方民族主义论述而行。这些以古蹟保育，争取保留殖民时期的民间记忆的运动，也引来建制派的恐慌，斥之为「恋殖」心态。但争议既然展开，有关殖民时期香港人的感受和经验，便随之而突破民族主义的官方框限，在重估殖民过去中带出今昔之比，从一座旧建筑的保卫，到怀念殖民岁月的人情、生活和消失中的制度和旧有规范。这种情绪慢慢被一种全面否定后九七现状的「抗陆」论述所吸收，这已不是原来运动的组织者所可以驾驭的广泛社会情绪。在反皇后码头拆迁运动中，抱城市运动目标的社运推动者，召唤多元种族共用皇后码头的庶民记忆，精神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本土观念，批判殖民史观及后九七的发展主义乃单一排他的社会逻辑。但在反高铁运动中，反发展至上的观念已经碰上反对中国与香港过快地融合的问题，「中国与香港关系」与反对不民主的基建规划，同时成为运动激起的课题，聚合了驳杂多样的支持力量。

而在反高铁运动集合了前所未有地多的社运组织包围立法会之同时，互联网上已开始流行讥讽过多来自大陆的「自由行」游客为「蝗虫」的「恶搞」（讽刺）影音创作，及大量转发大陆游客在香港随街便溺的照片。反高铁运动结束后的几年以来，对中港过速融合的忧虑，终于使本土意识的追求发生了方向上的大逆转。2012 年广东道一所名店前发生拒绝让香港人拍照，但让大陆游客拍照的事件，激发有反大陆豪客情绪的网民反弹。在网民号召下，发生了连番抗议示威及集资在报刊刊登全版「反蝗虫」广告的事件。而文化评论人陈云亦在相若时间出版他的著作《香港城邦论》，论述他鼓吹香港要进行族群政治，全方位反对大陆人入侵香港的右翼本土论说。自此，香港的本土意识追求便由重写殖民历史的、非排他的多元文化左翼立场，让位于明确地以激化「中港矛盾」作为新的抗争手法的右翼路线。

这一两年来，连番出现了大量可归类为「中港矛盾」的社会衝突，包括大陆「自由行」来港的大陆游客过多、开放大陆汽车来港的「自驾游」恐慌、父母均非香港人的「双非婴」令本地孕妇分娩孩子的床位严重不足、走私外国婴儿奶粉返内地导致香港奶粉供应出现短缺、「双非儿童」来港就学令本港学童学位不足、梁振英酌情聘用了居港未足七年且有共青团员背景的人为特首办助理、有大陆学生被怀疑在课堂强行要求老师改用普通语授课……等等。这些「中港矛盾」的事件广泛地引起关注和讨论，矛头直指已成北京傀儡的梁振英政府，以及香港根本没有向中国大陆说不的权利，「高度自治权」名不符实的现实。人们对已经超负荷的「自由行」人数，及在大陆居民移居香港问题上，香港并没有审批权的事实，产生愈来愈多的不满。他们更关注到各种基础建设，新城镇发展计画，以及



区域经济重组的各种构思和政策，香港人大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规划」。而文化上，普通话和简体字有慢慢取代香港原有文化习惯，成为新的文化霸权的趋势，大专校园也出现大陆研究生比例过高的忧虑。这种种风波令人担心，香港不单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失去自主性，政府失去面向市民的民主问责性，也会使香港的独特文化消亡。在这背景下，「反陆抗中」的本土主义便蔚然成风。

在这些林林种种令香港人不安的问题下，各种「反陆抗中」的论述纷纷涌现。当中包括上述的「城邦自治」论和香港自决／独立（广义的「港独」）论。虽然两者潜存著重大的价值和理论的分歧，但他们都乐意以「本土主义」作为共同的旗号和目标。因为「本土优先」是他们的共通原则，他们也认为只有本土主义才能激发出可以突破当前政治闷局的情绪化抗争手法。这套新的右翼民粹主义，既否定了一直以来主流民主派政客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言秽语）」作为抗争手法的底线，也抛弃了各个传统的社运团体及民间组织所习惯的社会运动方式。他们甚至认为早前由「80 后」所开拓的运动，也都受制于各种原因，使斗争手法和斗争目标都处处自我设限，无法争得真正的胜利。这种种以鼓吹利用极端表达方式来推动的本土运动，特别利用了网络上新建的新媒体平台，卷起一阵又一阵的风潮。在网络世界上，除了对传统「泛民」派的攻击外，也掀起了几波「左翼」与「右翼」的对抗，形成新的对立和分歧，不时吸引了正规媒体的关注。

十、重返华夏还是去中国化？

不过，一如发生在很多其他西方国家相类似的极右民粹主义反移民运动，这一阶段的右翼本土主义运动参与者的成分和目标都非常驳杂，难有一贯理论分析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当中，主要分为香港独立派和城邦自治派。

事实上，追求香港独立的声音，既没有在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期间出现，在迈向 1997 的「过渡期」以至「回归」后的头几年，「港独论」也都没有成为气候。原因除了当时普遍香港人并不视中国人身分是互相矛盾，并且有颇强的中国民族意识之外，也因为香港媒体惯性地都有自我审查违反大一统主张的习惯。例如报章普遍都视台独、疆独、及藏独为高度政治敏感的问题，香港独立的主张更被视为奇谈怪论。但如前所述，自九十年代开始，质疑中国大一统的思想，渐渐开始萌芽。这些声音往往迂迴地首先表现在如何看待台独运动、台湾自决诉求的态度上。但是，在公共论述的领域，形势是相当一边倒的。那些表达反对大一统的少数人，只要表达一下认为台湾人有「自决」其前途的权利，立即会受到各方的批评和攻击。当中最主要的反对声音来自亲中共的左派势力，但亲国民党的右派及香港的民主派，有时也会加入批评。其中一个知名的例子就是《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作者锺祖康。他在 2000 年因为发表文章支持台湾人自决前途，就受到一百多篇批判檄文的攻击。另



一位评论人马国明在 2004 年也只是在一篇文章简略提到香港「政治自决」，也引来连番批判。不过，虽然当年出面声援马国明的人并不多，在网上也首次出现了一个名为「我是香港人连线」的群组，姿态相当激进地将香港视为被中国吞併，并提出香港人要自决前途的主张。可是，这些零星组合后来在政治上并没有进一步的迴响。直至 2011 年，自决论和港独思想才再次借助新一波的本土主义风潮而再现。当年互联网上零散地出现对大陆人反感的讯息，后来更凝聚为一个名为「香港本土力量」的群组，积极地推动反大陆人的「反蝗虫」运动 。

除港独之外，陈云所鼓吹的「城邦自治」论则拒绝以争取香港独立为目的，反而是以一种「香港遗民」的论述去述说一种名为「城邦自治」的政治远景。他一方面强烈批判香港主流泛民为「离地中产」（因为他们拥抱西方「普世价值」，所以被斥为美帝代理人），又攻击社运分子为「左胶」（因为他们只识人人平等、反对歧视的「政治正确」），皆因他认为两者都分别中了「大中华情花毒」，所以同是祸港罪魁。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保卫香港这「遗民族群」免遭赤化，目的不在令香港脱离中国，而是为了要保存香港为将来复兴「华夏文化」做准备，因为只有香港才保存了未经中共摧毁的真正华夏文化。他预期中共一定会崩解，到时城邦自治便有实现机会。在遥远的将来，香港可以加入某种统合「中华世界」的邦联。

这种既要与中国脱离，又要宣称真正地承继了中华文化道统的主张，实在带有冷战年代右派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影子，他们当年也是既反西方也反共。再者，陈云与反共新儒家同样心仪一个消失了的中国，同时全面否定现实中的中国，而且也一样寄情于将来以文化反攻大陆的远景。不过不同的是，五十年代的新儒家埋首于心性之学，道德教化，但陈云却绝少在著作中徵引「新儒家」学说，而是以政治道术和「现实政治」的谋略家（「国师」）而自豪。他的未来政治蓝图甚至将香港自比为「帝国」，称香港应该透过殖民（或租借）与香港接壤的周边地区来输出自身较优越高等的文明。这个带有一种逆向的霸业宏图在背后的思想，或者更多地是承继自古代亚洲诸国先后抱有的一种「小中华主义」。这些在中原周边的较小民族，也有一种「华夷变态」的理论，用中原的中华文化被破坏为理由自命复兴中华文化。

在自视香港为「比中国更中国」的态度上，陈云和他要攻击的主流泛民所持的「异见民族主义」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只是他认为后者将香港发展族群自保的急务，让位于支援大陆的民主发展是没有希望的。相反地，他为了一种需要不断延搁的「反攻大陆」的想像，颠覆了民族主义视所有成员为平等国民或「同胞」的现代价值观，反而以「文明」高下来解释大陆与香港之间的分别，间接诉诸香港人殖民经验中（自身代入英帝事业的）「开化蛮夷」的使命感，与一百多年前买办阶层的文明优越感隔代呼应。所以，城邦之论一方面召唤著一种没有冷战环境的冷战反共斗士精神，另一方面也召唤一种没有了大英帝

国的「高等华人」文明优越论。而这种形象和意志，是以一个只存在于未来的华夏中国为目标。

究竟香港的本土意识应否与中国彻底割裂，在陈云身上可以见到这种强大的张力。不过，他的激进「反蝗」主张，鼓吹「勇武」族群抗争的言论姿态，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吸引了不少怀有强烈反中国情绪的人支持。因为无论是「港独」派还是「自治」派，都对族群对立所能掀起的动员情绪力量有相当的寄望。可是，两派理念实际上是南辕北辙。因为，陈云不断强调以复兴华夏为目标，被港独派视为还是不能脱离「中华情花毒」。因为不少有反大陆情绪的香港人，心态上其实并不单只是希望政治上远离中国，也要远离中国文化。例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不遗馀力的锺祖康，就大力批评陈云的城邦自治说只是一个骗局。他认为，如果香港人委屈地自命为道统传人，以中国文化传承者自居，也是与真正想把香港拯救离开中国文化大染缸的目的背道而驰。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港独论者眼中，陈云的城邦自治其实并无具体目标（而陈云本人也曾坦承，城邦自治其实只是为了落实一国两制）。在港独论者看来，为了所谓城邦自治的斗争，其实只是一场虚幻的战斗。

然而，相对来说，抗陆拒中所带动的潜在港独欲望虽然普遍，也更为贴近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愈走愈远的年轻一代真实的心情，但是港独派在组织上更为鬆散，不断产生内部分裂，也没有发展出详尽的理论。 而整个反蝗版的右翼本土意识和运动，至今仍然环绕在书写有强烈煽动性的陈云一系。原因可能是，城邦自治的诉求其实十分空洞，勇武亦没有定义，难言如何才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这系列的本土族群主义行动，根本没有一套一贯的关于何谓「香港人」的定义。 但弔诡地正因如此，却可以令附从者分享那种民粹式批评修辞带来的亢奋，抒发生活被「大陆人」这个「他者」形象不断挤压所带来的不满。而正因为这「他者」不能定义，永远在含糊状态，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扩充其内容，抒发不满情绪。 至于「华夏中国」是否只是狂想，「城邦自治」是否是一个乌托邦的故事，根本就不重要。 相对而言，高举香港独立运动的旗帜，并要化为具体可行的纲领，而非只是让读者飞驰其文化历史想像的（半）文学式写作，乃是一件代价十分高昂，成事机会极之渺茫，回报亦十分不确定，道路也更加艰难的选择。

族群民粹主义在过去几年，竭力以攻击温和泛民主派及左翼社运为目的，并试图将香港民主运动的低迷和挫折，归咎于两者的大中华情意结，称其出卖香港族群的利益。他们被指责为视本地争取自治和民主运动必须屈从于「建设民主中国」的空洞和必然失败的诉求下。这些批评更多番攻击这些运动每次都是最终妥协，实质是帮助了中共「维稳」。为了把香港命运和「无可救药」的中国切割，2013 及 2014 两年的悼念六四晚会都受到不同方式的攻击，攻击者认为主办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长期以来都是「大中华派」的泛民政客捞取政治本钱的把戏。于是，有呼吁香港人忘记六四这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事的主张，也有人提出要以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取代以「民主爱国」为主调的另类六四纪念，更有人



主张要把悼念六四纳入本土反共的议程。2014 年在尖沙咀就有人主办一个以本土反共为主题的六四悼念晚会，并攻击依传统在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指称参与维园集会的是「中国人」，参加尖沙咀集会的才是「香港人」。这项争议遂成为本土族群主义和香港二十五年以来悼念六四的传统最直接的决裂和较劲。结果，尖沙咀集会有数千人参与，而维园集会仍有十多万人参加。总体上，今年参加悼念六四的香港人以破纪录的方式上升，放下六四包袱的倡议显然并没有效果。而另起炉灶的本土反共六四悼念，与其实已成本地传统的维园晚会支持者的比例，亦一目了然。这亦间接说明，主张香港全面与中国问题切割的那种族群主义所获得支持的程度。

十一、普选、「占中」与本土意识

上述自从 2003 年七一大游行以来第三波本土意识的蓬勃发展和产生的争议和混乱，皆与中共偏离了原来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愈来愈远的大趋势有关。2014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公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坦白地展现了过去十多年以及在可见未来，中共如何以「以我为主」的原则，大幅收紧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承诺，试图扭转和修改一直以来香港人普遍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理解。中共之所以抛弃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的怀柔统战的姿态，明白亮出要君临天下的架式，当然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改变相符，而且也与要在 2017 年落实香港特首的普选有关。中共所能容忍的是一个事先能保证结果在操控范围之内，先行「筛选」、再交一人一票的所谓「普选」制度。这显然是一个玩弄假民主的把戏，也是对三十年以来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抱有信任态度的严重嘲弄。

回顾三十年前，大部分香港人无奈地接受移交主权的命运，但基于对中国开放改革的憧景和对以香港作为对台统战的「示范单位」政策有信心，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人渐渐接受回归，并积极以争取普选行政及立法机关成员的「普选运动」，作为迎接「港人治港」时代的回应，并且视之为迈向后英殖时代，建立香港主人翁身分的体现。基本法写下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进程，以 2017 年为终点，达致普选。但这许多年来，中共三番四次在民主发展步伐上与香港人的普遍意愿发生衝突，也导致民主派内部的大分裂，并激起上文所分析的激进本土主义。面对这种以民粹式动员为特徵的本土主义，民主派政党的领导权威和团结性快速瓦解，公民社会亦束手无策。

不过，2013 年由无党派的法律学者戴耀廷发起了「占领中环」运动，设计出一个结合商讨式民主（台译「审议式民主」）、全民投票及公民抗命（台译「公民不服从」）几个主要环节的反抗运动，务求施压中共接受一个保证人人有平等被选举权的方案，为香港深陷困境的反抗运动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一方面，占中运动较以前日趋被动的民主运动进取，



公然宣示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来争取「合乎国际标准的真普选」，修正了过去只是争取跟中央沟通和谈判的过分温和路线。但另方面，针对内部撕裂为不同部落、日益互不信任，深陷无止尽的左与右之间派性争幻的状况，占中运动设立多重的商讨和投票机制，意图以讨论、协商、投票等运动内部的民主，去平衡民粹主义互相攻击和减低过度情绪动员的伤害。在运动筹备的漫长过程中，占中运动所展现的中产阶级理性温和的政治风格，虽然并未能平息社运和激进政治党派的批评，失望和怀疑的态度同时来自社运内的左翼及右翼，但是，这些持不同判断的多种力量，亦没有提出过任何更有效的方法，去呈现香港人执著于实现普选的意愿。占中运动作为这一阶段民主运动的焦点目标，因而得到默认。

占中运动的成败未卜，现在仍无法下定论，但它肯定是一个充满想当然式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创新。可是，因为香港正处身于对温和改革已绝望，但激进的革命条件却也远未成熟的中间状态，占中运动自然而然地成为唯一能聚合困局中的反抗力量的中心。2014 年 6 月就占中运动应支持哪一个普选方案进行的全民投票，就取得超过七十九万投票人数的成绩，也带动了今年 7 月 1 日回归日大游行中重现 2003 年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场面，而专上学联和学民思潮两个学生团体，亦自发地组织了有限度的所谓「占中预演」。行动导致超过五百位参与堵路的公民抗命者被捕，但却展示了一种新的香港公民集体行动方式，也为重新修复民主运动一度的低迷、混乱，走出过去三十年日渐失去了进取心的「虚拟自由主义」反对派政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而「占中运动」的历史意义，亦不在于这连串的行动能否真正争取到落实真正普选的结果，而是在过渡期 / 回归政治共识已经崩溃的当下，重新以公民社会、公共文化为基石，找寻新的团结基础，抵御来自内外的侵蚀力量，建设香港人的政治共同体。这是给予香港生活及政治共同体一个有别于族群民粹主义和偏锋式激进主义的另一种选择。而且，透过一种更进取的，由和平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所推动的运动，争取了最大程度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在团结社会大多数的前提下，「守卫我城」的公民行动成了重新启动香港本土意识运动的契机，和萌生有更广泛基础的反抗运动的起步。

十二、总结：在族群主义之外

上文分析香港本土意识及族群政治的历史，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时空，箇中勾勒出战后三波本土意识热潮互相之间承传与超越的错综关系。本文对香港族群的历史构成的分析，贴近晚近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族群性视作历史过程的产物，而非以罗列某种既有的族群特徵来定义香港本土族群。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见到在不同的时期，香港本土身分和本土意识都有不同的课题，面对不同的约制结构，也有著不同的「他者」，因而衍生出不同的本土身分和本土意识的形貌。正如 Fredrick Barth 指出，族群身分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底下，通过群体互动，亦即通过选择性地挪用一些历史和象徵性的



记忆，甚至发明一些传统，方会产生标示出族群与族群之间差异的边界。所以，我们不单可以指认出为族群成员所共享和传承的文化记忆和象徵符号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也可以看见它们之间有时是互相矛盾甚至断裂的。

在本文的分析当中，香港本土的族群身分呈现出一个複杂的面貌，它既曾有帝国与殖民权力留下的烙印，也有从殖民权力破茧而出的印记，当它要鬆开殖民权力的束绑，它也与不同时期的天朝修复 / 民族主义的事业交迭纠缠，你我难分。它们既是香港的历史的真实传承，也是未来族群认同发展的基础。香港一百多年的过去，在帝国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徘徊，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城市，这城市慢慢孕育出一种可以值得骄傲的公民文化和各式各样的公民实践经验。本土运动如果要补足社会运动从来欠缺的历史感，以便在地的生产出这个公民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具主体性的身分认同，就要批判性地反思及回溯这个共同体的演进和处理内外差异的经验。只有这样，本土意识才会超越文化差异的简化描述，和将差异本质化和拜物化的倾向。将差异拜物化的族群抗争是危险和自毁的，因为由这种倾向出发，会衍生出无止尽的「出生论」、「成分论」等部落式衝突。它不利于促进更高政治目的，反而在内外製造更大的间隙，把已被挤压扭曲的自我进一步碎裂，难以构成持久的行动力。相反地，面对国家主义对本土自主性的吞噬，全球新自由主义透过国家权力侵害地方自主的压力，香港所需要的是可以让这个城市兼容成员的多样性，而亦可以凝聚出自身集体主体性的历史叙事。

香港在面对殖民未解，一国两制危如累卵，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政治经济重组的压力愈来愈大的情况下，族群主义差不多是必然的政治现象。可是族群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有明确价值观的意识型态，它可以助长团结但也可以催生分裂。它介乎部落血仇、诸神大战与追求建国独立的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于是，建立有持久力的本土抵抗，就不能不认清这个城市的过去，以利在当下及未来开展适合于这个地方的政治论述，避免走进和它的历史性格不相容的误区。放在香港解殖未完成的处境去考察本土意识在历史中的状态和变化，关键之处并不在重複指认哪些是香港人或香港文化的特徵，识别出那些和简化了的「他者」的差异，从而在一个平面上巩固一种关于「我族」的自豪感、优越感，填塞那些被衝击、被压碎、被排斥的自我认同；也不在于以清洗主义的方法，排除掉与新旧殖民他者互动所产生过的各种（无论是「恋殖」或是「大中华」的）「情意结」。因为这些认同的记忆，总是与香港的殖民经验（包括与「殖民」周旋的「民族」经验），产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们存在于「我们」的记忆、经验和想像中间，等待被召唤和动员。但产生的后果，却难以事先被判断。香港解殖之複杂，一如所有后殖民社会的複杂。如何能在複杂交缠的关系中找寻建立历史主体性的健康力量，在于我们如何能耐心地解开与主体形貌粘连纠葛在一起的殖民 / 反殖民经验，正视香港那种「殖民」与「国族」共谋协力的独特关系，以及与这些经验交缠在一起的各式感觉结构。把这些需要耐心相互聆听的解殖过程，



简化为重拾民族身分（人心回归），或（本土）族群意识的醒觉，都未免只是把複杂的微创手术简化为器官的切除或肢体的重驳。

为了避免重蹈「反殖」而不「解殖」的覆辙，走出在抵抗中只是複製你的敌人的困局，香港具主体性的未来政治共同体想像，不能从原生主义式的族群主义进路出发（因为那些都只能是虚构的和不符複杂的香港历史实况的），而是应该正视建设公民社会，依循公民共和的原则，以公民实践超克族群主义的分裂政治，并且以公民主体性的历史演进的角度，扣连一个关于香港人主体抗争精神浮现及挣扎的历史叙事。因为当代香港之能具有生命力及独特的价值，是因为成功地克服了战后因为民族主义和冷战分裂所形成的难民社会状况，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难民社会孕育出一个没有国族包袱的公民社会，超越和克服了早期因宗族、乡党和两大意识型态造成的分断。因为只有反思和整理这些破碎的、快将被遗忘的主体抗争的事蹟，提炼背后的经验及精神，香港人的历史主体意识方能完整浮现，内部的差异多元才能妥善疏理，以帮助塑造一个具历史意识的公民社会。打碎公民文化的经验和伦理，以回溯／虚构一个不经定义的「前公民」族群想像，并不会真正找回一个团结的本土原生族群，而是将香港拉回难民社会相互践踏的过去。 相反地，只有建基于历史意识的公民社会，才能建立一个团结的公民政治共同体，抗拒香港在天朝主义下的再殖民化。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李佳凝

设计：池春荣，季文仪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